

《正音新纂》中的南京官話音系 及其切音設計*

曾若涵**

摘要

晚清的許多官話教材雖然轉以北方官話或者北京官話為主，也以北京官話音系作為拼音設計的基礎，然由於讀書音及南方官話的長期積累，許多官話書籍事實上雜揉了南北官話特點，便於取得較高的實用與流通價值。然而，仍有部分著作保留了較純粹的南京官話，讓我們得以觀察南京官話的樣貌。本論文以《正音新纂》(1902)為主要討論對象，並以德人何美齡《南京官話》(1902/1907)、以及中華教育會的《官話羅馬字》(1904)等書作為拼音參照。三書出版年相近，都出於傳教士之手，皆具有普及教育之實用目的，可互為參考。又因是傳教事業的基礎，故而重視音節的呈現，編纂體製有別於中國傳統音韻書。本文利用馬鳴鶴的編排方式，比較南京官話與南京方言文獻相關後，將前人研究所擬《正音新纂》音系進行了些微調整；並發現馬鳴鶴於南京官話切音設計中，結合了傳統漢字切音以及英語音節拼音的特色，本文最末亦對馬氏的切音(拼音)進行了評價。

關鍵詞：南京官話、正音新纂、切音／拼音、音節表、傳教士

2021年9月4日收稿，2022年2月6日修訂完成，2022年7月22日通過刊登。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中國音韻學第21屆學術研討會暨漢語音韻學第16屆國際學術研討會」(成都：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2021.8.22)，獲得與會學者諸多鼓勵與指正；而後並承《漢學研究》兩位審查人惠賜寶貴建議，特此致謝。

** 作者係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清末的官話韻書或官話教材已出現由南方官話往北方官話靠攏的趨勢，當時洋人所編纂的官話相關字典多以北京音為基礎，如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的知名北京話著作《北京話音節表》(*The Peking Syllabary, Being a Collection of the Characters Representing the Dialect of Peking*, 1859)、《語言自邇集》(*Yü Yen Tzū Êrh Chi, a Progressive Course Designed to Assist the Student of Colloquial Chinese*, 1867)等。又如司登得(George Carter Stent, 1833-1884)所著《漢英合璧相連字彙》(*A 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in the Pekinese Dialect*, 1871)，司登得於書名中直接點出了所採語言為「北京方言」而非「官話」。¹

即使當時的官話辭典或教材選擇了以北方官話作為著書的語言基礎，書中仍能展現編纂者在南北官話之間，乃至文語與俗語之間的選擇困境。² 日本人中田敬義(1858-1943)也曾於《北京官話伊蘇普喻言》(1879)中的〈例言〉第3條指出當時的中國語有文話、官話、俗話等種類，日常的應答論辯雖然多用官話，但在該書翻譯時多雜用之，因此仍是個南北混雜、古今兼收的語言用書。³ 有趣的是，書中的英人

1 據沈國威(2011: 158)所述：「在此之前的辭典常常表明採用了『官話』(“Mandarine”或“court”)或某一種方言，司登得的字典第一次標明是北京方言。」引文中的“Mandarine”當為“Mandarin”之誤。若我們不限於字典，在司登得之前，威妥瑪《北京話音節表》(1859)、《尋津錄》(1859)都已經於書中明確指出採用的是北京方言(Peking dialect)。相關論述可參(日)千葉謙悟(2010; 2019)。

2 如美國傳教士盧公明(Justus Doolittle, 1824-1880)於其《英華萃林韻府》(*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72)〈序言〉曾說：「關於在此類著作中漢字應該根據北方官話還是南方官話進行注音的問題，學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人曾誠懇地建議我根據南方官話的發音進行羅馬字注音。但是我在天津居住的時候，曾經學習過北方官話，如果根據南方官話進行注音的話，可能會出現許多的混淆和錯誤，所以我不能採用這個建議。」原文為英文，此譯文引自沈國威(2011: 166)。

3 原文：「支那語ニハ、文語、官話、俗話等ノ種類アリヲ、稍々差別アリ、我儕ノ通常應答辨論スルニ當テハ、多ク官話ヲ用フ、然シトモ此書ノ如キハ、雜用シテ以テ借東挪西ニ便ス。」參見(日)中田敬義(1879: コマ6)。日本的數位掃描資料另有標示コマ(koma)，指的是線上數位版本的頁次，本文若遇線上文獻古籍有原典

艾約瑟 (Joseph Edkins, 1823-1905) 〈序〉稱中田敬義此書採用「北京官話」；中國人英紹古〈序〉稱田中已習得「南方華音」，但譯書時採用「北方官話」；美國人丁韞良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 〈喻言序〉則稱「譯以中華北京土語……異方人學習京音者之一助。」⁴

可見，在當時的北京，對於城中所用的官話並沒有統一的說法，對於此通行語的語音性質也沒有一定的、精確的認知。即使中田已於書名中標上「北京官話」，但同時期的其他學者不一定有此共識，且中田也是在南北官話之間選擇了北方官話作為譯書的標準，但是書中並非純用北京官話。根據筆者觀察，該書內容呈現了南北官話夾雜的狀態。⁵

儘管如此，仍有部分音韻著作反映了較純粹的南京官話系統，如馬鳴鶴《正音新纂》(1902)、德人何美齡 (Karl Ernst Georg Hemeling, 1878-1925)《南京官話》(*Die Nanking Kuanhua*, 1902/1907)、⁶中華教育會 *The Standard System of Mandarin Romanization: Introduction, Sound Table, and Syllabary* (1904, 以下簡稱《官話羅馬字》)等，⁷這些著作帶有教育、普及等實用目的，編纂者都是傳教士 (馬鳴鶴是中國籍傳教士)；做為傳教

頁次不明的情況，則以コマ取代頁碼。

- 4 前揭資料中，艾約瑟〈序〉見(日)中田敬義(1879: コマ2)，英紹古〈序〉見同書(1879: コマ3)，丁韞良〈喻言序〉見同書(1879: コマ4)。
- 5 儘管學者如齊燮認爲《語言自邇集》的問世可作爲北京官話地位上升，勝過南京官話的標誌(2018: 183)，但是南京官話在讀書人之間的影响力一直延續到民國初年。1913年「讀音統一會」議定漢語標準音(老國音)時，仍在北京話基礎上將南京官話特色納入其中，成爲一個複合音系。
- 6 何美齡《南京官話》於1902年初版，1907年作爲萊比錫大學博士論文再度出版於哥廷根(Göttingen: Druck der Dieterichschen Univ.-Buchdruckerei (W. Fr. Kästner))。本文因未能取得初版，故以後者爲參照資料。以下引用時皆以1907年的版本爲據。何美齡另著《英漢字典及翻譯手冊》(*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and Handbook for Translators*, 1916)，與前書相較，折衷了南北官話共同特色，並以「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來稱「官話」，採用了與田中敬義、老國音相似的折衷辦法。
- 7 中華教育會(Education Association of China)委員會(Conference Committee on Romanization)編，本文引用美國加州大學圖書館藏本。

事業的基礎，這些書籍特別重視音節的呈現。我們可以利用這類文獻，來避免南北官話混雜的困擾，單純地來看南京官話的音系以及音節，同時觀察傳教士如何運用中英音節的差異來展現南京官話的拼音策略。本文以《正音新纂》為主要文本，並著重在身兼中國文人與基督教傳教士的馬鳴鶴的折衷視角。

《正音新纂》的相關研究並不豐沛，目前能見到的直接論述有彭靜（2014; 2015）、汪瑩（2020）等論文，都是針對音系的討論。彭靜認為該書記錄了清末的南京官話，音系中呈現江淮方言特徵，如韻母系統中：（1）-m 韻尾消失且都變為 -n；（2）-an/-ang 不分、-uan/-uang 不分；（3）-en/-eng 無別、-in/-ing 無別；（4）沒有入聲韻尾但有入聲調；（5）有 o 韻但無 uo 韻；（6）清楚區分 o（渴）和 e（克）兩韻。（2015: 234）彭靜並指出該書聲母系統亦有江淮方言特徵，如（1）濁聲母多已清化；（2）區分平翹舌；（3）區分尖團音；（4）沒有 n- 聲母，中古泥、來、娘母以及部分疑母字已變讀為 l-（2014: 98）。汪瑩的看法與彭靜一致，除了語音特徵之外，尚指出《正音新纂》音系應為清末南京方言的讀書音系統而非口語音系統，屬於江淮方言的一種（2020: 102）；汪瑩擬出 21 個聲母（含零聲母）、43 個韻母，韻母的構擬中包含了入聲與非入聲的對立（2020: 103）。

上述研究雖仔細分析了音韻演變及其方言特徵，但對於作者的編纂意圖、編排設計、作者對南京官話的觀點皆著墨較少。本文以為，基於南京方言的複雜性，⁸ 僅用方言資料來進行比較，會因方言調查的區域、對象而有落差，若能加入作者馬氏對其南京官話教材的音韻設計理念、如何展現音節拼音等主觀因素，我們對此書所描繪的音系與切音，可能會有不同的了解。因此本論文欲以上述前人成果為基礎，進一步加以探究。⁹

8 根據劉丹青、李榮（1995: 4）：「南京方言的內部差別非常顯著，不同年齡之間，城內各區之間，城鄉之間，不同家庭背景之間，都有差別。」

9 前人文獻中關於明清官話或正音資料的論述頗多，這些資料當中偶有提及《正音新纂》者。如石崎博志將狹義的正音資料定義為：「書名冠以『正音』，於雍正皇帝〈上諭〉（1728）之後到民國期間，在中國出版且其運用目的乃是用以習得『官話』的資料。」（2014: 12）石崎此定義直接將清朝的正音概念與官話聯繫起來，並將《正音新纂》歸於此類，指出狹義的正音資料中又可細分廣東系與福建系兩類。石崎並云，

總上所述，本論文以文獻分析及資料比較為主，討論焦點有二：其一，欲探討《正音新纂》切音／拼音中、馬鳴鶴所欲描述的南京官話音韻系統，試圖對前人擬音進行再探討；其二，透過馬鳴鶴所設計的切音與書中的音節組合，探析《正音新纂》中特有的南京官話切音方式及作者的切音教學策略。

二、《正音新纂》撰作目的以及對南京官話的認識

(一)《正音新纂》的撰作目的

馬鳴鶴（生卒年不詳），號九皋甫、鈍齋，江寧（今南京市）人，曾任南京基督書院教習超過20年，並以多年的傳教及語言教學經驗撰成《正音新纂》（1899成書，1902付梓）。¹⁰《正音新纂》的撰作目的，可簡單歸納為二。第一，為了讓華人透過中國切法來學習西洋拼法（尤指英語之拼法）；第二，為了推廣官話正音（此指南京官話）。

關於第一點，馬鳴鶴〈啟〉（1902: 2）曰：

鄙意謂，普通學者當推能讀西書為要，能讀西書當推能識各國拼法為要，能讀各國拼法，又莫急於先知中國切法之準，而後以切法學拼法，祇在預知各國字母，即能自讀西文為獨近也。

馬鳴鶴此書迎合了當時廣推西學的社會潮流，認為在普通學¹¹的學科中應

廣義的正音資料，為上述定義之外並涉及正音或官話的資料，如《李氏音鑑》（1805）、《別弊廣增分韻五方元音》（1810）等（石崎博志 2014: 12）。

- 10 書前依序有鈍齋自撰之〈啟〉；上元（屬今南京江寧）縣事戴光〈序〉；大美國基督書院院長美在中（F. E. Meigs, ?-1915）、及長老會傳教士李滿（Charles Leaman, fl. 19th century）共同列名的〈譯序〉；張遐齡〈弁言〉；李籛筱〈解說〉；馬鳴鶴〈自序〉等序文，清楚敘明成書緣由與撰作目的。馬鳴鶴並在〈自序〉後分別撰有〈說音〉、〈發義〉、〈發明〉、〈凡例〉等篇，可藉以了解其撰作的理論基礎與音韻觀點。
- 11 清末政府正式引入西方學制，湖廣總督張之洞及管學大臣張百熙曾分別奏派羅振玉、吳汝綸等人到日本考察教育，因而制定了《欽定學堂章程》（又稱「壬寅學制」，1901）及《奏定學堂章程》（又稱「癸卯學制」，1904）（周愚文 2015: 4）。因參考

鼓勵閱讀西書。而閱讀西洋之書，須從學習拼音開始；若要學習各國語文的拼法，要先學習中國切法，他相信學子透過中國切法來學習西洋拼法，進而能自行閱讀西洋文獻。中國切法是否有利西洋拼法的學習？確實有待商榷。但馬鳴鶴之觀點受到部分西洋傳教士的支持，如美在中、李滿於〈譯序〉（1902: 12）中云：

即凡我西人之學習中國官音而欲其口齒清切，當亦如中國士大夫視此書為學習西文之階梯，為誠不可少之書也。縱為久居中國之西人，苟於官音不洽，而欲改正其音者，亦為非此書不可得其正。

在馬鳴鶴眼中，《正音新纂》可作為華人學習西方語言的教材；而在西洋傳教士的眼中，《正音新纂》亦可作為西方人學習官話的正音教材。¹²

《正音新纂》的撰作目的之二，乃為推廣官話正音，此正音乃指南京官話。馬鳴鶴於〈發義·九問〉（1902: 36）明言：「今汝正音之法，其僅正南京音乎？抑並正同在帡幪內之音乎？曰：余為南京人，故正音必先自南京始，示不忘本也。」書中多處以「南京官音」稱之，如書中收錄李錢筱〈解說〉（1899/1902: 16）：「南京官音三百六十一。」為避免名詞紛亂，本文統一稱作南京官話。南京官話也是當時江淮一帶傳教士所學習的主流中國語，馬鳴鶴期待以書中的切法讓中國人習得外語拼法，同時讓中國人與外國人都能夠反過來利用書中的拼切方法來熟習南京官話的音節及聲韻組合。

了日本學制，其中的普通學的普通二字可理解為普遍、普及之概念，而普通學可大致理解為基礎學科。又據周愚文（2015: 16），羅振玉於 1902 年所撰之〈教育贅言八則〉第一則即指出：「因近代教育家均以義務教育為教育的基礎，而義務教育者，令全國人民知各盡國民的義務，如尋常及高等校學的教育，故主張立學，必定義務教育主義，必使全民全受普通之教育，悉知尊愛之知識。」馬鳴鶴的教育觀點，也受到同一個時代氛圍影響，其所謂的普通學，與羅振玉、張百熙、張之洞等人對普通學之概念相去不遠，都是在為國家培養普通之才、並且造就通才。相關文獻或可參錢鷗（2009）。

12 相關敘述亦可參美在中、李滿〈譯序〉，《正音新纂》（1902: 11）：「先生與我西人接垂二十年，其教讀新來西人久，留意於西字母拼合之精奧權力。所謂聯合恰巧輕重急徐混含微顯續斷停頓之，不即不離為獨了了也。肆自先生外，其音聲吐屬清切，當鮮有出其右者。矧又先生正音之法，實為獨出心裁，藉使我輩依西字母而取假中國之音，以立我規則，亦未必能尚其長也。」

換言之，馬鳴鶴希冀創造一個中西通用的切音／拼音法，不僅要能顧及中國式切音傳統，還要考慮西洋（尤指英文）拼音習慣，以利教育推廣。由於馬氏切音法考慮了在南京官話與英文拼法之間的互用，因而我們需要知道他所理解的南京官話音系為何，才能知道他如何建構一個與英語有關係的官話切音法。

（二）《正音新纂》對「南京官話」的認識

《正音新纂》與《正音切韻指掌》（1860）、《正音通俗表》（1870）都屬於明清以來所謂的正音書，正音書的目的是要推廣正音，但不同的正音書對正音的描寫方式，與對正音或官話的定義也有所差異。¹³ 馬鳴鶴出身南京、於南京任教習，於書中多次提及對南京官話的看法，如〈自序〉（1899/1902: 21）開宗明義指出：

正音者，為正語言文字之聲音也。顧聲音之別有二，一官音、一土音，官音如南北二京音者是，土音如土俗及外地纖巧油滑之音者是。但無論官音、土音，究不外乎先當察考音之所以然，而後官音、土音總能得其正軌，亦能得其地之音多少之數。

馬鳴鶴認為「正音」是導正語言文字之聲音，而聲音又可分為「官音」（南京音、北京音）與「土音」兩類。在馬氏的敘述中，正音並未完全等同於官音，他認為「官音、土音總能得其正軌」，亦即官、土音各自有其標準，此見解頗為開創。雖然《正音新纂》所要推廣的仍是官音而非土音，但是在正音的概念上，比起同時期的音韻文獻都來得開闊。馬鳴鶴的「正音」亦可用在方音、土語之上。《正音新纂》中，馬氏強調書中「正音」即「官音」（指南京官話）的同時，也對土音有所說明，並未加以排斥或忽略。¹⁴

其次，上述引文中「……得其正軌，亦能得其地之音多少之數」一句，

13 相關研究可參（日）石崎博志（1998; 2014）。

14 此段敘明馬鳴鶴對官話及正音的認識，但是對於官話是否等於正音、南京話是否屬於官話的問題，學界眾說紛紜，有支持也有反對。反對的意見如戴黎剛（2017: 40）認為在明清時期，正音雖然等同官話，但是把南京話當作官話是明清時代的流行誤解。本文目的不在論述南京話是否為官話、是否為正音等問題，在此不多申述。

反映了馬氏對於語音的認識是建立在音韻系統之上，故而非常在意聲、韻、調的數量，乃至於該系統能夠拼合出的音節數量，也是馬氏關注的焦點。故馬鳴鶴於〈凡例〉第十條（1902: 58）指出子母相生官音共 361 個，而子母相生土音有 353 個，官音與土音一共 714 個音；僅看官音的話，若將聲調都考慮進去，可得 1103 個音。¹⁵ 馬氏所謂「子母相生音」乃是指將子音（韻母）、母音（聲母）拼合起來，可得子母相生音（音節）。換言之，是一種子母音拼合的概念，傳統的中國反切法中常需要將反切上下字中的多餘成分摩切掉，但是《正音新纂》中的母音（聲母）和子音（韻母）卻利用了符號化的「定型字」，¹⁶ 將每個聲母以及每個韻母都設立代表字，此即書中所謂 34 個子音、20 個母音。這種定型字的概念已經擺脫了中國切音法的音類概念，進一步細分音節中的音位，並且讓一個音位（聲母）或一組音位（韻母）只用一個定型字來代替。¹⁷ 因此，我們可以

15 原文：「子音、母音、子母相生音，合三百六十一官音。至子母相生土音，合三百五十三音。共官、土二音七百十四音，而官音所得五聲總數，共核為一千一百有三聲。」此外，馬鳴鶴〈凡例〉第 9 條（1902: 58）：「每子母相生音後，即註明所得官音若干，以便稽核。」

16 定型字的概念最早出現在佛經漢譯，譯經師將梵文或佛經語言用漢字進行音譯的時候，多使用固定的單音節漢字來對譯特定的梵文音節（或一個韻律單位），如對譯 *kā* 多用漢字「迦」、對譯 *gā* 多用漢字「伽」，此兩漢字互換使用的次數極低。相關論述可參 Shu-Fen Chen（2003: 38）。

17 馬鳴鶴〈發明〉（1902: 50）指出：「舉凡韻中調所當定之字，皆於韻中本所有者，非敢創舉也，為其能得尾音之正也。」文中「當定之字」，即本文所稱定型字之依據。此外，馬鳴鶴選用定型字時，應未考慮是否為「常用字」。《正音新纂》主要用為課堂教科書，需要由教師授課領讀，只要能夠記憶拼讀的過程於邏輯即可，故所選之字是否常用，應非馬鳴鶴的主要考量。再者，由於《正音新纂》非僅標註南京官話的音節，還有土音（吳語）音節，例如書中說明「隔」母可與不同子音（韻母）產生 13 個南京官話音節組合，亦可產生 20 個土音音節，故書中載：「凡土音二十，隔哋、隔以、隔野、隔羊、隔要、隔因、隔巖、隔崖、隔約、隔用、隔日、隔有、隔雅、隔噁、隔鬱、隔遇、隔越、隔云、隔願、隔啊。」（1902: 49）考慮到這些定型字同時用於官話與土音，若定型字有太多異讀，將會影響拼音時的正確性，也可能造成學習者的混淆。馬鳴鶴於書中並未提及「常用字」的觀點，就現實而言，常用字也並非最佳方案；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目的若是讓學習者把這些定型字作為符號

據此製作《正音新纂》南京官話音節表（附錄一、附錄二）。¹⁸

馬鳴鶴對其正音（南京官話）音韻的描述可見〈自序〉（1899/1902: 22-23）：

先審得尾音三十四音，名為子音；起音二十音，名為母音。即以每一起音又名開口音通切尾音又名收音，諸音一遍名為以母生子，遂得南京官音若干音。彼凡非南京官音，別為土音，逐一如是。合生南京官音三百有七音，加之子母五十四音，通得南京官音三百六十一音。緣各索為字，成三百六十一字。此三百六十一字，設施之平仄，可普通之話語千萬文字。

上文中，馬鳴鶴所謂「子音、尾音、收音」者，即一般理解的「韻母」，涉及音節中的介音、主要元音、韻尾等三部分，而不涉及聲調；此「子音」共 34 個。馬氏所謂「母音、起音、開口音」者，為一般理解的「聲母」，書中之「母音」共 20 個，不含零聲母。此聲母 20、韻母 34 之數，即為南京官話的基礎，並且能夠彼此拼出 307 個音節，加上切音用的字母 54（子音加上母音之數），共得南京官話 361 音節，並「各索為字，成三百六十一字」。此 361 音節之代表字正是馬鳴鶴用來作為聲韻拼切口訣的用字，可推演出同音節但不同聲調的音。

三、《正音新纂》所描寫的南京官話音系

馬鳴鶴對音節的概念與傳統中國文人大為不同，他考慮韻母的時候

記憶下來，那麼定型字是否常用，非屬必要考量。

18 馬氏的觀念裡，南京一帶所使用的語言包含官音與土音，他沒有刻意忽略土音的存在，只是在《正音新纂》所呈現的音節表是以官音來設計的（附錄一）。即使馬氏認為官音、土音都能有標準音（正音），但是《正音新纂》仍是以推廣南京官話此一目的而存在，土音在書中僅是附加說明。補充說明，本文所提到的南京官話，其通行範圍並不限於今南京市內。根據馬鳴鶴的傳教意圖，以及當時美國基督會主要的傳教範圍，《正音新纂》所謂南京官話，其通行區域應是與現今江淮官話區大部分重疊。這也符合明代南直隸省、清代江南省的地理分布及南方官話方言區的歷史發展。明代南直隸省相關研究可參丁蓉（2011）；明代南京官話的性質可參曾曉淪（2016）。

並不把聲調作為優先考量，因此每個韻母不依陰陽上去入加以區分。此種對音節的認識，類似近代音常用的韻部概念，但更類似現代音節表，故我們可輕易將其 361 個音節製成一張表格，與卷帙相對繁複的明清韻圖大異其趣。¹⁹ 雖然《正音新纂》中完全沒有使用西洋符號，仍須透過擬音才能了解書中南京官話之音值，但是透過音節中的聲韻組合，我們也能夠探求音位的界線以及其中的音韻特徵。他之所以不於書中使用羅馬符號，可能預設了讀者具備英文字母的基礎知識，如當時的西洋傳教士或者基督書院的學生。換句話說，馬氏預設其讀者能在《正音新纂》之標音方式，以及英語字母發音中順利進行轉換。

(一)《正音新纂》中的南京官話聲母系統

馬鳴鶴所使用的定型字中，「收尾」為子音（韻母），而「開口」乃指母音（聲母），可見其〈說音〉（1902: 26-27），引文中加黑點（文字強調標記）的字，即書中所用之定型字：

茲審得收尾喉音五，哋安拗額偶是也。齶音十五，以野羊要因巖崖約用日愛我翁恩啊是也。鼻音二，唵問是也。齒音三，有雅鬱是也。唇音九，遇越云願無忘危歪娃是也。又審得開口齶音三，曰隔、曰嗜、曰克。舌音五，曰抵、曰離、曰耳喜、曰蹠。齒音七，曰持、曰知、曰氣、曰視、曰時、曰此、曰子。唇音四，曰比、曰符、曰靡、曰關，此誠開口、收尾二音之出於自然而不待生者也。顧吾思喉齶舌齒唇鼻，既發而為五音，動而為六律，控送以為鼓吹。

19 觀察其他清代韻書，如《正音切韻指掌》的韻類考慮了聲調，「翁韻第三」(-uŋ) 下所列 /huŋ/ 𪛗 huŋ 音節，分別有「薨洪頤闕」4 個代表字，代表字與反切下字顯然依據陰陽上去四聲分韻，但是滿文對音皆同為 𪛗 huŋ (1860: 657-658)。《李氏音鑑》中的反切下字也依聲調而區別，如「十紅」韻中同樣是 /huŋ/ 音節，分別有「烘紅噴闕斛」5 個代表字，代表字與反切下字（翁童孔甕屋）顯然依據陰陽上去入等五聲分韻，但是對應聲韻所對應的打馬字都是同一個符號 (1810: 474)。可知傳統對反切上下字的安排，必然會將聲調納入體系；然而這些音韻學者在偶然或者受到其他語言影響的情況下，可能不自覺的應用出不納入聲調考量的韻母符號。馬鳴鶴則是有自覺的在音節系統中排除了聲調的影響，並未替不同聲調的韻設計反切或下字。

馬氏承襲中國傳統，利用發音部位來對發音進行說明。傳統上的「五音」多指聲母的發音部位，但馬氏也將之應用於韻母。觀察其聲母，發音部位的分布是：

表一 《正音新纂》中的聲母發音部位分布

部位 (數量)	母音序號	說明
1. 齶 (3)	隔 ⁶ 嗜 ⁸ 克 ⁹	近似舌根音。
2. 舌 (5)	抵 ³ 離 ¹¹ 耳 ¹⁴ 喜 ¹⁷ 蹠 ¹⁸	近似舌尖音、舌面前音。
3. 齒 (7/8) ²⁰	持 ² 知 ⁵ 氣 ¹⁰ 視 ¹⁵ 時 ¹⁶ 此 ¹⁹ 子 ²⁰ [及 ⁷]	齒音近似舌尖前、舌尖後音。 及 ⁷ 漏列，依部位放置於此。
4. 唇 (4)	比 ¹ 符 ⁴ 靡 ¹² 關 ¹³	即一般認識之唇音。

上表依據馬氏〈說音〉所列，一共 19 個音，「及」母不知何因漏了，本文依發音部位補入齒音位置。每母之後所標數字，為《正音新纂》20 母的順序。此順序是依據英文字母序，並考慮了英文輔元音組合時的「拼法」，²¹ 而未以發音部位、發音方法來做為優先排列，但可知馬鳴鶴對於發音部位的理解是清楚的（參表二）。

表二 《正音新纂》20 母順序與英文字母順序對照²²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Ch	D	F	G	Ge	Gi	H	K	Ki	L	M	P	R	S	Sh	Si	T	Ts	Tz
比	持	抵	符	知	隔	及	嗜	克	氣	離	靡	關	耳	視	時	喜	蹠	此	子

20 馬鳴鶴（1902: 27）曰「齒音七」，實漏列「及母」，故齒音應有 8 個。

21 馬鳴鶴《正音新纂》〈發義·十問〉（1902: 36-37）：「此字母二音之位次，皆藉西國嘆咭喇二十六字母序次相訂。其音輕重一綫貫下，若一移易，將有如黃鐘太呂黍粟之誤矣，故先後有不可自用者。」事實上馬鳴鶴重視英文拼音時的音節發音，非僅注意到英文字母本身的發音。

22 表中的英文單字為筆者所加，為方便理解而設置，馬鳴鶴並未於書中列舉英文單字。

(續接表二)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e, ban	check, church	deer, do	far, food	gem, genre/ʒ-/	gab, get	gee, gym	hand, heat	kind, kite	kee, key	leg, low	me, minute	pack, peak	real, row	see, since	shade, shift	see, since	tea, ticket	guts, it's	tsar (czar, czar)

以下根據表一、表二，並參考音節表（附錄一、附錄二），討論幾個問題：

1. 由於「及₇」母被置於隔₆母與嗜₈母之間，應該是介於字母 G 與 H 之間。依照官話聲母，亦應是接近 G 類輔音聲母。²³
2. 觀察 20 母中的第「6、7」；「9、10」；「16、17」等三組連續出現的聲母，在英文字母中對應相同的字母 G、K、S，事實上此三組展現的是舌根音顎化及尖團音分立的現象。「及₇氣₁₀喜₁₇」與「隔₆克₉嗜₈」對立，由中古牙喉音顎化後分化出來的一套聲母；觀察《正音新纂》收字，「及₇氣₁₀喜₁₇」母尚未混入精組字，在《圓音正考》（1743）中皆屬團音字。且「及₇氣₁₀喜₁₇」又與「子₂₀此₁₉視₁₅」對立，「子₂₀此₁₉視₁₅」母之收字在《圓音正考》中皆屬尖音字。此尖團分立現象正是南京官話有別於北方官話的特色。為展現拼音上的區別，表 2 將「及、氣、喜」母分別標註為「Gi、Ki」，「喜」母依語音變化應標為 Hi，但馬鳴鶴將「喜」母列在「視時」兩母之後，可知此類字之發音部位已經前移，故標為 Si。觀察音節表（附錄一），「及、

只是，馬氏的音位概念並不精確，例如他以英文的 B- 來對應漢字的「比」字聲母，顯示他不強調或不知道雙唇塞音的清濁區別，也不清楚英文 /b/ 與官話「比」字聲母的音值有別；此外馬氏對於送氣與否、捲舌程度的描述也很模糊。因此表中所列的單字，僅是概略地比較。

- 23 這裡提到了字母 G，順帶討論為何馬氏將「知」母列為 G、而不設計為 zh 的原因。馬鳴鶴在設計拼音時，優先考慮英語的音節組合以及英文字母順序。首先，zh 這個組合在英語拼法中幾乎不存在，故不會被馬鳴鶴列入考慮。其次，zh 在排序中必須放在所有聲母之末（Z 為英文最末的字母），但是馬鳴鶴將「知」聲母放在「隔、及」聲母之前，因此只可能是英文字母 G 以及 G 之前的符號，若用 zh，將違背馬鳴鶴書中所強調的設計原則。

氣、喜」母只與細音韻母拼合，也能印證此三母已是顎化音。²⁴

3. 關於「耳₁₄」母，《正音新纂》把官話中應為零聲母的耳字作為聲母，²⁵主要是為了取其捲舌的特徵，馬鳴鶴（1902: 26）將耳母描寫為「口開舌上曲回，空際合喉音」。此外，由於馬氏將「耳」母列入舌音而非齒音（見表一），推測「耳」母的舌尖捲曲程度尚不及「知、持、時」三母，比較接近齒齶近音 [ɹ] 的音值。²⁶但為了比較方便，同時表現「耳」母已帶有輕微捲舌性質，擬為 [ɹ̥] 亦無不可。
4. 關於「離₁₁」母，《正音新纂》離母下收 22 個音節中，有 n-/l- 混用的情形，如切音「離安難」（1902: 71）之音節下云：「難音凡三聲，難懶爛」，考慮江淮官話中常見 n-/l- 互為變體的情形，《正音新纂》無

24 馬鳴鶴〈凡例〉第 12 條（1902: 58）：母音中如「知及氣」三音、「氣持」二音、「視時喜」□□□屬纖微之別，遇與子音相生，於官、土音仍為易混，學者更當相究。（□□□處為漫漶無法辨識之字）可知上述所舉數音，是容易誤讀的發音。

25 「兒耳二」等字在《南京官話》（1902/1907: 11）中標為「êrh」；在《官話羅馬字》（1904: 19）標為「er」。馬鳴鶴以「耳 /ɹ- or ɹ-/」字作為聲母，此聲母若遇上「日 /ɹ(?)/」韻時，並不以舌尖後元音 /ɹ(?)/ 作為韻母，而要轉變為 /əɹ/ or /ə/ 韻母。換言之，在「日」韻字的四個音節「持知耳時」當中，「耳」是一個特殊音節。這使得馬鳴鶴對於舌尖元音的安排有別於學界一般的安排。以國語來說，是把舌尖元音 ɿ、ɿ 合併、把捲舌元音 /ə/ 獨立。馬鳴鶴則是把帶捲舌特徵的 ɿ、ə 合併、而平舌的 ɿ 獨立，這是出於對音位區別特徵的選擇不同。此外，「耳」字在當時傳教士的紀錄中大多記為「êrh」，這個標法展現了「耳」字的發音過程，亦即從 /ə/ 起始、進而舌尖上捲但不觸及上顎的動態過程。若取其上捲後的「結果」來作為聲母「耳」的發聲基礎，則是強調一個從上捲狀態反向釋放的過程，如此一來便極為近似 /ɹ- or ɹ-/ 的發音。馬鳴鶴精準掌握了英語 r 的拼音模式，在英語中，r 不作為詞首時，如在 fur、here 等詞之中，r 的發音近似 êrh 或 /ə/；當 r 作為詞首，如在 row、red 等詞當中，r 的發音則近似 /ɹ- or ɹ-/。總言之，馬氏對「耳」母、「日」韻的設計，主要仍是參考了英語的拼音模式，這是馬鳴鶴的學術構思，亦為其拼音設計的特殊之處。

26 《南京官話》對「熱、然、若、絨」等字的聲母，都以 j- 來標示而不用 r-，根據其觀察與描述，「熱」等字的聲母亦較接近近音 [ɹ]。其說明引述如下：“j, as in jên, jang etc.: as in the French Jean but voiceless and with the tip of the tongue raised towards the upper gums. Often it is formed so loosely as to resemble an r-sound. It also frequently changes into y (especially before o and u as in jo, ju, jung), the tip of the tongue being lowered instead of being raised.”（1902/1907: 25-26）

法清楚區別 n-/l- 聲母之字，亦無法區別離母所收字之不同中古來源，故汪瑩（2020: 103）直接擬為 [l]。而趙元任（1929/2015: 260）記錄之南京音系亦為「l、n 不分，都併入 l（奈讀如賴）」。²⁷ 筆者以為可將離母擬為 [l]，因為其次序列於糜母（M）之前。雖擬為音位變體 [n~l] 亦可，然根據《南京官話》（1902/1907: 26）的描述，n-/l- 發音趨同，是一種較接近 l，但帶有鼻音性質的發音；²⁷ 《南京官話》在拼法中也兼收 n-/l- 兩聲母，但是將兩聲母放在同一組音節之下，如第 151 組音節：「liao：聊了料／ niao：孃鳥尿」（1902/1907: 15）可知這兩組字可視為同音位，《南京官話》沒有將 n-/l- 統一成一個符號，或許是顧及到了北方官話以及讀書音的需求，但是《正音新纂》中兩音清楚合併成了 L 一類。

5. 承上，觀察《正音新纂》收字，與馬氏對南京官話聲母的編排、描述與收字之後，本文擬出 20 母音值如下：

表三 《正音新纂》20 聲母音值

比 [p]	闢 [p ^h]	靡 [m]	符 [f]	抵 [t]	踈 [t ^h]	離 [l]	隔 [k]	克 [k ^h]	嗜 [x]	
及 [tɕ]	氣 [tɕ ^h]	喜 [ɕ]		子 [ts]	此 [ts ^h]	視 [s]	知 [tʂ]	持 [tʂ ^h]	時 [ʂ]	耳 [ɹ / z]

馬鳴鶴所認識的南京官話，若不含零聲母，有聲母 20 個，含零聲母計 21 個。其實馬氏也有為零聲母音節設立定型字，只是他未將零聲母列於母音中，因為零聲母無法對應英文中的輔音字母。馬氏將零聲母的概念置入子音（韻母）之中，將子音 34 字皆設計為零聲母音節，如此一來不僅能突顯介音，亦能便於切音。

（二）《正音新纂》中的南京官話韻母系統

若同樣用馬鳴鶴所陳述的發音部位來整理子音 34 字，可得出 34 字

27 原文如下：“l and n as in li, ni, lao, nao, etc.: are not recognised as separate consonants. The actual sound by which both are pronounced is that of a nasalised alveolar l, in forming which the tip of the tongue only just touches the upper gums.”

之分布如表四，子音右側數字為《正音新纂》所編排的次序：

表四 《正音新纂》中的韻母發音部位分布

部位 (數量)	子音序號	說明
1. 喉 (5)	咍 ₁ 安 ₂ 拗 ₃ 額 ₄ 偶 ₅	皆開口。開口較大、無介音的元音。 ²⁸
2. 齶 (15)	以 ₆ 野 ₇ 羊 ₈ 要 ₉ 因 ₁₀ 巖 ₁₁ 崖 ₁₂ 約 ₁₃ 用 ₁₄ 日 ₁₅ 愛 ₁₈ 我 ₂₀ 翁 ₂₁ 恩 ₂₃ 啊 ₃₂	齊齒，或具顎音性質。
3. 齒 (3)	有 ₁₆ 雅 ₁₇ 鬱 ₂₂	
4. 唇 (9)	遇 ₂₄ 越 ₂₅ 云 ₂₆ 願 ₂₇ 無 ₂₈ 忘 ₂₉ 危 ₃₀ 歪 ₃₁ 娃 ₃₃	具撮口、合口性質。
5. 鼻 (2)	嗯 ₁₉ 問 ₃₄	有較顯著鼻音。

從上表可以發現，序號 1 至 5 都是喉音，序號 6 至 23 幾乎都屬顎音、部分屬齒音，序號 24 至 33 幾乎是唇音；此外鼻音零星出現。連續序號與發音部位的對應，意味著韻母的發音部位主要是依介音類型來安排，故知上表中的喉音基本上對應開口呼；顎音基本上對應齊齒呼；唇音基本上對應合撮兩呼。

上述 34 韻母，原則上也遵循了英文字母排序，而英文 26 字母中的元音依序有 a、e、i、o、u 等 5 個。大抵喉音對應英文字母 a、e 起始的韻母，顎音及齒音對應 i、o 起始的韻母，唇音對應 ü[y]、u[u] 起始的韻母。鼻音則是不考慮介音，而是把有較顯著鼻音的放在此類。以下針對馬氏所列子音音節進行說明，但礙於篇幅，若與前人見解相同者，則略過不贅述。

1. 喉音部分，據馬氏的說明，皆為開口音，其中「咍₁」有音無字（有入聲），因其搭配「子此視」三母（見附錄一），可擬音為舌尖元音 [ɿ]；然據書中收字，「咍」無入聲音節，故應無 [ɿʔ]。與「咍₁」近似的尚

28 序號 1 至 5 的喉音，馬鳴鶴（1902: 9-10）分別簡單描述如下：1. 咍，口開舌橋喉微出音。2. 安，口開舌凹喉大出音。3. 拗，口開舌凹喉重出音。4. 額，口開舌凹喉重入音，顎音凡一聲額入聲。5. 偶，口開舌凹喉重無出入音。

- 有「日₁₅」，馬氏（1902: 14）：「口微開牙合舌上曲上齶掀起音」，知「日₁₅」舌頭上捲，且「日₁₅」僅能搭配「知持時耳」四母，故擬音為 [ɿ]、[ʮ?]。「咍₁」與「日₁₅」被馬氏列為不同的發音部位，可能由於二者中古來源不同，前者多來自古精組字故而不演變為翹舌，後者多來自古知照日母。後者的齶音性質比較高故而列入齶音，或單純是根據翹舌抵到了上顎故而列入齶音，若依馬氏的音感，即上述「舌上曲上齶掀起音」。此外，日母又作為「耳」字的切音「而日耳」（無入聲），故本文也將耳的韻母 [əi] 列入日母音位之內。²⁹
2. 「安₂」未被馬氏列為鼻音，且例字中皆為古舌尖韻尾及舌根韻尾字，多有混用；如其切音「無安，忘」（1902: 19）、「持安，長」（1902: 34），部分南京官話相關論著將 an、ang 擬為一個 [aŋ]，如徐朝東等（2018: 3）；汪瑩（2020: 103）則擬為 [ã]，符合趙元任（1929/2015: 254）的擬音。然而，《南京官話》（1902/1907: 29）描述此音的韻尾如英文的 sin、sing，而不是描述為帶鼻音的元音，³⁰與馬氏的描述頗為相符。故本文擬為 [an~aŋ]，如此亦使系統較為整齊。與「安₂」相近的還有「啊₃₂」，但其收字皆不帶鼻音成分，且有較多入聲音節如「罷發」等，故可擬為 [a]、[aʔ]。至於馬氏將「啊₃₂」列齶音，是出於個人音感，認為「啊」發聲之際會短暫與前顎發生作用。³¹
 3. 「拗₃」不與「及氣喜」、「符」等母搭配，且此音節全無入聲字。從馬氏的排序可理解為主要元音 a 帶了 o 或 u 韻尾，本文依汪瑩（2020: 103）、趙元任（1929/2015: 254）擬為 [au]。
 4. 「額₄」，為「口開舌凹喉重入音」（1902: 10）「額」音之收字比較複雜，其音節分布如表五：

29 相關說明參見註 25。

30 原文略引如下：“an, ang, as a single syllable and as a final; as in an, ang, chan, chang, etc.: the a of both as is the English father; the dental and guttural nasals as in the English sin and sing. About their complete confusion [...]”

31 馬鳴鶴（1902: 20）描述子音「啊」：「口開舌曲抵根底上下唇大窩聚上齶空起送出音。」

表五 《正音新纂》子音「額」音節之韻母分布（韻母拼音取自《南京官話》）

聲母 韻母	白	微	得	廢	這	隔	嚇	克	勒	美	珀	然	色	捨	特	測	則
額舒	pei	ch'ê	—	fei	chê	—	—	—	—	mei	p'ei	jei	—	shê	—	—	—
額促	pai	ch'ai	tai	—	chai	kai	hai	k'ai	lai	mai	p'ai	jê	sai	?	t'ai	ts'ai	tsai

觀察表五，「額」音收字中，舒音與促音的來源不同，因而《南京官話》將舒促音記為不同韻母，且在舒音當中還有 -ei/-ê 的對立。而馬鳴鶴書中將《南京官話》記為 -ei/-ê/-ai 的字可以歸成一類。考慮弱化的方向，「額」的主要元音若為 -a-，很難解釋 e 與 ê[e] 如何能並存；此外，觀察其他南京方言資料，可知除了 ei 之外，並無其他下降複元音的組合，且 e 與 ê 並無明顯對立。綜上，本文依汪瑩（2020: 103）擬為單元音 [e]、[eʔ]。劉丹青等（1995: 18, 23）則擬舒音 [e]、促音 [eʔ]。

5. 「偶₅」音，收字全無入聲，且《南京官話》雖都記為 -ou，³²但在《正音新纂》中「偶」並不與其他 o 元音音節相鄰，而是列於「額」音之後，故推測馬氏的認知中，「偶₅」應當較近於 eu 或 əu，本文參考前人資料，擬為 [əu]。
6. 「野₇」收字多為入聲，也有部分舒聲音節。入聲來源多為古山咸兩攝字，舒聲來源主要是古假攝字，如「視」母「野」音所收之字五調俱全，分別是「些_{假邪}寫_{假寫}謝_{假謝}洩_{假洩}山」，³³從馬氏對收字聲調的判斷來看，他能夠區別舒入；但是《南京官話》對假攝來源的舒聲字與山咸攝來源的入聲字標音相同，如「些邪寫謝洩」全列入 sieh 音節而不加區別。由於馬氏能夠區別舒入，故本文擬「野₇」為舒 [ie]、入 [ieʔ]。
7. 「羊₈」擬為 [iaŋ] 無疑義。雖「安」[aŋ]、[an] 相混，但 [iaŋ] 並不與 [ian] 混，因為後者已經異化為 [ien]。³⁴

32 根據《南京官話》（1902/1907: 29）對 ou 韻母的描述，確實是接近 êu 的音值。

33 洩字在《廣韻》中屬蟹攝，但到了《洪武正韻》時已與山攝合流。

34 汪瑩（2020: 103）擬為羊 [iã]、巖 [iê]，但這些音節的元音鼻化在《南京官話》及《官話羅馬字》中並未被描述。此外，鼻音性質在韻尾或者主要元音上並不形成對立，故本文仍擬鼻音韻尾。

8. 「因₁₀」收字有古臻梗深攝字，在《正音新纂》主要表現為 [in]、[iŋ] 不分。³⁵
9. 「崖₁₂」列於齶音，是因崖字音節為 [iai]，³⁶ 但其收字中亦包含「豺」音節 [tʂ^hai]，推測在馬氏音感中，聲母過渡到韻母的過程中可能有個滑音 j，成為 [tʂ^hai]，使其韻母接近「崖」音節。實則「崖₁₂」與「愛₁₈」形成互補（見附錄一），「愛₁₈」可擬為 [ai]。汪瑩（2020: 103）擬為「愛」[ɛ]；根據何美齡（1902/1907: 27-28）的描述，[ai] 或 [ɛ] 的差異主要來自聲調，但二者並無對立，本文依 [ai]。
10. 「約₁₃」僅收入聲字，在《南京官話》的音標中有 io（約覺卻學）、o（虐削雀爵）兩類，由於《正音新纂》合於一類，故本文皆擬為 [ioʔ]。
11. 「用₁₄」在音節表中僅有韻目而不與其他母音拼切，是因馬氏將「用₁₄」[iuŋ] 與「翁₂₁」[uŋ] 分開。馬氏有意將 -i- 起始的韻母排在一起，使得「用」獨立出來。「翁₂₁」被馬氏列入齶音而非唇音，推測其合口特徵尚未突顯，《南京官話》（1902/1907: 103）亦將「翁」拼為 ung 而非 wung。³⁷ 本文擬音為「用」[ioŋ] 與「翁₂₁」[oŋ]。
12. 「嗯₁₉」是個「口開舌縮鼻送音」但「有音無字」（馬鳴鶴 1902: 15），不與其他母音搭配。唯一用途是作為「恩₂₃」（[əŋ]、[ɛŋ] 相混）的組成音「額嗯恩」（1902: 17）。故「嗯」為接近 [-n~-ŋ] 的發音。參考劉丹青等（1995: 11），南京方言中有成音節輔音 m、n、ŋ'，考慮《正音新纂》中的對立，本文擬為 [n~-ŋ]。

35 何美齡（1902/1907: 29）將 in、ing 韻母描述為“complete confusion”，而非一個融合的音節。《南京官話》（1902/1907: 7-8）指出在 a、ê、i 之後的舌尖鼻音 n 與舌根鼻音 ŋ 有混用的情形，且讀單音的情況下多讀為 -n 尾，但是後接其他字連讀時，常變為 -ŋ 尾，人們時常不自覺地變讀，難以預測此兩音的演變。類似的描述也可參考趙元任（1929/2015: 260）所述：「en（真）eng（蒸）不分，現在寫作 eng（實在的讀音是 en、eng 混用）；in（今）、ing（京）不分，現在寫作 ing。an（山）、ang（商）不分，現在寫作 ang；uan（官）、uang（光）不分，現在寫作 uang。」由於是這樣的一個複雜過度期，所以學者擬音時多將 -n / -ŋ 兩類統一為以下三種之一：-n 尾、-ŋ 尾、元音鼻化。

36 汪瑩（2020: 103）漏列「崖」擬音。

37 《官話羅馬字》（1904: 30）將「翁」字拼為北京 weng、南京 wung，應是為求拼法統一，故都加上了 w 字頭。

13. 「我₂₀」韻帶有些微的合口性質，可擬為 [-o] 或 [-uo]，《正音新纂》中「我」韻的描述中也可看到此一說明，書中云：「口窩開舌縮上顎空起音。」(1902: 16) 再者，《正音新纂》中的「我」韻是第 20 個韻母，未排列在合口介音性質強烈的「無₂₈」至「問₃₄」之間，因此可推測「我」韻中包含了 /-o/ 與 /-uo/ 兩種變體。當時「我」韻字的 -u- 介音恐怕還不明確，故馬鳴鶴以 /-o/ 為主要考量。我們可在趙元任 (1929/2015: 278) 的擬音中看到類似狀況，趙元任將「我」字標為 /o/，且系統中沒有 /-uo/ 韻的存在。汪瑩 (2020: 103) 的擬音也同樣是有 [o] 無 [uo]。有趣的是，衛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漢英韻府》(*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74: XVI) 的音節表中，o 韻的橫列當中，同時收有 /-o/、/-uo/ 兩音，如「河 ho」、「火 hwo」，可以證實 /-o/ 及 /-uo/ 互為變體的推論。到了御幡雅文《華語跬步》(1903/1908)，書中音節表〈官話音譜便覽〉(コマ 11-14) 中的「我果多火波說佛若……」等字，一律都標示了 -u- 介音特徵。關於南京官話中的 /-o/、/-uo/ 變體，不同的紀錄者對於此變體的聽感不同，標示的狀況也不盡相同；本文暫擬為舒聲 [o]、入聲 [oʔ]。
14. 「鬱₂₂」雖然無法與母音搭配，但馬氏云：「以無鬱」、「鬱音凡一聲，鬱去聲」(1902: 16) 可知「鬱」音並非有音無字的音節。與「鬱」相近的還有「遇₂₄」，「遇」有舒促之分，撮口已經很清楚，故馬氏描述為「口先開後上下唇窩聚舌尖曲抵下齒舒送音」(1902: 17)；相較之下，「以無鬱 i+u>y」這個切音用意描述撮口形成的過程，故可將「鬱」、「遇」皆擬為 [y]。³⁸
15. 「越₂₅」的舒聲來自中古果假攝 3 等，促聲來自山攝入聲，可擬為 [ye]、[yeʔ]。
16. 「云₂₆」、「願₂₇」可搭配的母音與「遇₂₄」「越₂₅」一致 (參附錄一)，可知此四組子音皆為撮口韻。「云」、「願」可分別擬為 [yn]、[yen]。

38 馬鳴鶴〈凡例〉(1902: 58)：子音中如「雅啊娃」三音，「恩恩」二音，「約我」二音，「崖愛」二音，「吡野鬱」三音，皆屬纖微之別。凡以母音相生於官、土音易混，學者不可不察。

17. 「無₂₈」、「忘₂₉」、「危₃₀」、「歪₃₁」在音節表中呈現一致的音節分布，此四韻都屬於合口韻。「無₂₈」舒促兼具，可擬為 [u]、[uʔ]。「忘₂₉」有鼻韻尾相混的情形，可擬為 [uan~uan]；《南京官話》（1902/1907: 104）亦將 wan、wang 合為同一音節。³⁹
18. 「危₃₀」、「歪₃₁」乍看界線清楚，但「危_舒」對應《南京官話》的 ui (wei)，「危_促」對應 uai (wai)，「歪_舒」也對應 uai (wai)。以下舉三組例字說明：⁴⁰

表六 《正音新纂》「危」「歪」韻與《南京官話》之比較（拼音取自《南京官話》）

	危 _舒	危 _促	歪 _舒	歪 _促
隔 [k]	kui 規鬼貴	kuai 國	kuai 乖拐怪	—
克 [k ^h]	k'ui 虧魁傀愧	k'uai 闊	k'uai 崩快	—
噶 [x]	hui 灰回毀惠	huai 或	huai 懷壞	—

「國、闊、或」等入聲音節，何美齡認為與「乖崩懷」一致，但馬鳴鶴認為與「規、虧、灰」一致，恐怕是入聲的時長影響了聽感。馬鳴鶴既然將「國、闊、或」列為「規、虧、灰」的入聲，是否可據此將「危_促」擬為 [uiʔ]？關於這一點，恐怕還需要加以討論。

若將《正音新纂》中的「額、野、危、越」分別視作相配四呼的切下字，即假設此四個切下字應當帶有相同或相近的韻母時，不宜將「危_促」的音值擬為 [uiʔ]。⁴¹ 即使我們將「額、野、危、越」視為可相互對應的音

39 汪瑩（2020: 103）擬為「忘」[uā]。但馬氏並未特別指出此韻的鼻特徵，此韻之鼻特徵在韻尾或主要元音都是可能的變體，本文依馬氏以及何美齡的對音值的描述，不擬為鼻化元音。

40 關於「危」韻之例字，《正音新纂》「隔危貴」之下注：「貴音凡四聲，規鬼貴國，規上平、鬼上聲、貴去聲、國入聲。古切法，貴居胃反。」（1902: 52）「克危魁」之下注：「魁音凡五聲，虧魁傀愧闊……。」（1902: 65）「噶危回」之下注：「回音凡五聲，灰回毀惠或，……或入聲，又音滑、又音惑，同《孟子》：『無或乎？』」（1902: 61）

41 審查人指出「危、越」入聲沒有混入陰聲字，而「額、野」入聲中混入個別陰聲字，

位，但考慮到收字來源的複雜性以及互補音位的可能，此四韻也不必然符合整齊的對應；至少就《正音新纂》的格局來看，「額 e(?)、野 ie(?)、越 ye(?)」的對應頗為整齊，但是「危」韻相對複雜得多。先來比較一下其他南京官話材料如何記錄「危」韻字的讀音：

表七 《正音新纂》「危」韻字在其他相關文獻中的標音狀況⁴²

正音 1902	拉丁 1847	漢英 1874	支那 1895	南京 1902	跬步 1903
危舒 例：危捶對 追貴回尅類 蕊碎睡頹碎 最	-uei 灰規悔 wei 蝟衛會	-ui 追吹灰蕊 雖水對退 醉催 wei 威 -wei 歸虧 -ei 雷內	-ui 嘴ツイ雷ルイ -oi 腿トイ會ホイ woi 胃圍ヲイ	-ui 追吹歸虧 灰回會蕊 雷類內 wei 威為衛	-oi 規クヲイ 對トヲイ 回ホヲイ 嘴ツヲイ woi 為ヲイ

故審查人懷疑「額、野、危、越」四韻有其複雜之處，需要再討論。筆者雖認同審查人觀點，但理由與之不盡相同，因為《正音新纂》「額、野、危、越」入聲中看似混入的零星陰聲韻字，其實也可看作入聲字。筆者檢視《正音新纂》，「危」的入聲音節有「拙、國、或、闊」等字；「越」的入聲音節有「越、決、闕、雪、穴、絕」等字；「危、越」兩韻入聲中確實沒有混入陰聲字。再來檢視「額、野」兩韻：「額」的入聲音節有「白、徹、得、拆、嚇、勒、墨、珀、熱、色、設、特、測、則」等字，多為中古山梗曾攝之入聲字；其中「嚇」字有兩個中古來源，一是假攝去聲，一是梗攝入聲，若取梗攝入聲之來源，則「額」的入聲音節並未混入陰聲字。而「野」的入聲音節有「嚙、別、迭、竭、怯、裂、蔑、撇、洩、歇、鐵、切、接」等字，多為中古山咸攝入聲字；其中「洩」字在《廣韻》僅有蟹攝去聲一音，但在《洪武正韻》中有去聲「以制切」及入聲「先結切」兩音，其中「先結切」與前述入聲字中的「嚙、別、迭、竭、裂、蔑、撇、歇、鐵、切」發展一致。故可據以說「額、野、危、越」四韻的入聲中，並未混入陰聲韻字。

42 「拉丁」指李秀芳《拉丁語南京語詞典》(1847)，詳後註。「漢英」指衛三畏《漢英韻府》，相關研究可參林琳(2017a; 2017b)。「支那」指(日)岸田吟香校閱，(日)小倉錦太、(日)金澤保胤編，《支那南部會話：一名·南京官話》(1895)。「南京」指《南京官話》。「跬步」指(日)御幡雅文，《華語跬步》(1903/1908)，書中附有音節表〈官話音譜便覽〉(コマ 11-14)。

(續接表七)

正音 1902	拉丁 1847	漢英 1874	支那 1895	南京 1902	跬步 1903
危 _促 例：拙國闊或	-o(入) 國惑	-woh 國	-wo 國 クワ	-uai 拙國闊或	-uo 闊 クワー
額 _舒 例：卑車得 肥遮美熱		-ei 肥梅悲丕	-ui 美 ムイ	-ei 肥梅美	-(^w)ei 美 ムエイ 累 ルエイ

從表七可以發現，不同的材料對於《正音新纂》「危」韻字的相應標音有些微的不同，就「危_舒」的例字來說，於其他文獻可以再細分出 2 至 4 種標法。相同之處，皆是帶合口性質且帶元音韻尾 -i 的音位，但是合口的程度以及過渡音 -e- 的突顯程度有別。值得一提的是，「雷類／美肥」等齊微韻字在《正音》、《支那》中有 -ui/-ei 之別，但在《漢英》、《跬步》中歸為一類，只是《漢英》都標為 -ei、《跬步》都標為 -(^w)ei，推測合口的程度在音節內受到聲母的影響，又因紀錄者的聽感有別，因而有所不同。趙元任（1929/2015: 267）也分「雷灰 uei / 美 ei」兩類，可知《正音新纂》的「危」韻舒聲可擬為 [-ui/-uei]，與表六所得結論可以對應。

至於「危_促」之「拙國闊或」等字，雖然在《正音新纂》中與「危_舒」字搭配，但是不能逕擬為 [-ui?] 或 [-uei?]，因為此兩音皆不符合南京一帶實際語音。從表七來看，可發現有 -o?、-woh、-wo/-uo、-uai 四類標法；我們再參考相關研究中對「危／國」兩類字的擬音，有 [uəi/uəʔ]（汪瑩 2020: 103）、[uei/ueq]（趙元任 1929/2015: 258）、[ui/uai?]（徐朝東、陳琦 2018: 3）、[u(e)i/uai?]（張屏生 2002: 136, 140），徐、張的擬音相近，是因為都依據了《南京官話》。若要顧及馬鳴鶴的設計以及南京方言的本質，趙元任的擬音最為符合，故本文將「危_促」擬為 [ueʔ]。本文並未於後述表八中將「危」韻與「額 e(?)、野 ie(?)、越 ye(?)」同列，是因「危_促」雖與此三韻相對應，但是「危_舒」的語音變體較複雜，與三韻稍有別。

以上據馬鳴鶴的編排邏輯以及書中對音節的描述，並參考《南京官話》等書的拼音及音系安排，得出與汪瑩（2020: 103）43 韻母有別的 47 韻母，參表八：

表八 《正音新纂》34 韻母音值（入聲另計則有 47 韻母）

開舒	開促	齊舒	齊促	合舒	合促	撮舒	撮促
咍 [ɿ]	—						
日 [ɿ]	日 [ɿʔ]						
日 [əɿ]	—						
		以 [i]	以 [iʔ]	無 [u]	無 [uʔ]	鬱 [y][iu]	遇 [yʔ]
啊 [a]	啊 [aʔ]	雅 [ia]	雅 [iaʔ]	娃 [ua]	娃 [uaʔ]	遇 [y]	遇 [yʔ]
我 [o]	我 [oʔ]	—	約 [ioʔ]				
額 [e]	額 [eʔ]	野 [ie]	野 [ieʔ]			越 [ye]	越 [yeʔ]
愛 [ai]	—	崖 [iai] [ai]	—	歪 [uai]	—		
拗 [au]	—	要 [iau]	—				
偶 [əu]	—	有 [iəu]	—				
安 [an~aŋ]	—	羊 [iaŋ]	—	忘 [uan~uaŋ]	—		
		巖 [ien]	—			願 [yen]	—
恩 [ən~əŋ]	—	因 [in~iŋ]	—	問 [un]	—	云 [yn]	—
翁 [oŋ]	—	用 [ioŋ]	—				
				危 [ui~uei]	危 [ueʔ]		
嗯 [n~ŋ]（成音節）							

至於前述第三節第（一）小節引文中提到的五音、六律、控送等詞，並沒有特殊的音韻對應，五音即「喉齶舌齒唇」，而「喉齶舌齒唇鼻」合為六律，對喉齶舌齒唇鼻等發音之運用稱為控送。馬氏於《說音》云：「五音、六律、控送，皆在此區區之口而不可忘，語言吐納之由也。」（1902: 27-28）馬氏之意，謂能掌握五音、六律、控送等部位及技巧，就能發出正確標準的南京官話正音。

四、馬鳴鶴「南京官話」語音教材之切音設計

馬鳴鶴於《正音新纂》中所描繪的南京官話，可以透過書中所設計の切字法反映出來，馬氏所謂切字法，並非傳統上字取聲、下字取韻的反切法，而是類似連音拼讀的方式，以求接近英文の音節拼音方式。馬氏の設計中：首先，將每個聲母、韻母對應一個定型字，可說馬氏已經具備語音符號の初步概念，故而設計出 20 個母音（聲母定型字）、34 個子音（韻母定型字）。書中所有の音節組合都依賴這些定型字來拼合，此即馬氏所謂「子母相生音」，⁴³如「知額這」、「知偶周」、「知愛債」、「知我卓」（1902: 47），類似如國民教育，國小課程教授國語注音符號時の「(ㄛ) > (ㄨ、ㄛ) > (ㄨㄛ)」の口唱型態，藉由前兩個音得出目標字の讀音，此即馬氏所謂「正音之法」。⁴⁴但是《正音新纂》每個音節拼讀時不考慮聲調，故下字（第二字）與被切字（第三字）沒有對應の聲調關係，五調都能使用同一個子音（韻母、切下字）。以下我們試圖比較同時代の其他南京官話教材，進行南京官話切音の相關討論。

43 馬鳴鶴強調「子母相生音」不同於古人切音法，可參《正音新纂》〈發義〉中の第一問到第九問（1902: 29-36）此部分都在說明「子母相生音」與古人切音之別，闡釋過程雖多有比附，但重點在於馬氏所設計の子音都是零聲母字，母音都是開尾韻字，故在拼讀的過程中，上下字之間不會有多餘の成分需要排除，可視為一種反切改良法。主要觀點可參〈發義〉第四問：「開口音上實而下虛，收尾音上虛而下實，但皆自然之音，初不待生而即有者。然遇某字本開口音字，或遇某字本收尾音字，著以教後，勢亦不得不用子母相生例，取二字以定之。」（1902: 32）又可參考氏著〈發明〉對於反切改良之看法：「如昌字乃持安二音相成，中字乃知翁二音相成，茲為一冲字竟用『持安知翁』四音切此一音，不亦音難準乎。縱使切家特重『持翁』首尾二音，而中間『安知』二音未免有所闕礙，致音有轉折之誤矣。況如祇姑重所取首尾二音，則『徹公』、『吵烘』、『出同』、『察凶』等字相切，俱首尾有『持翁』二音，勢亦均可為『冲』字切矣。……總之母音用『持』、子音用『翁』，簡絕了當，惟謂為『持翁冲』可矣。」（1902: 52-53）

44 相關說明見《正音新纂》〈發義〉第八問。（1902: 35）馬鳴鶴亦曾強調拼讀之時應先讀出韻母，參見氏著〈發義·十二問〉：「正音之法何為必先讀子音？曰：子音，尾音也，尾音氣促而勢短，苦難確實，有如善畫者必望氣而後尚形。氣得而形得矣，語音之道亦然。」（1902: 37）

(一) 馬鳴鶴南京官話教材的音標次序

在切音／拼音方法中，音標次序的決定，會影響記憶與理解的邏輯。一般而言，音標次序多根據既有的知識基礎，只是不同的設計者所選用的知識基礎不盡相同。以聲母的比較為例，以下列出 (A) 《正音新纂》之 20 母以及汪瑩擬音，調整成發音部位排序，並與其他南京官話相關材料 (B 至 D) 進行比較，製成表九：

表九 《正音新纂》與其他南京官話文獻之聲母拼音符號比較

A. 正音新纂 20 母 1902			汪 2020 擬音 (IPA)	B. 李 滿標 音 ⁴⁵ 1897	C. 何美齡 ⁴⁶ 1902/1907	D. 中華教育 會 ⁴⁷ 1904	趙元任 1929 (IPA)	備註 ⁴⁸
01	比 b	必以比	[p]	b	p [p]	b (比 Bi)	[p]	
13	鬪 p	皮以鬪	[p ^h]	p	p ^c [p ^h]	p (皮 Pi)	[p ^h]	
12	靡 m	彌以靡	[m]	m	m [m]	m (米 Mi)	[m]	
04	符 f	夫無符	[f]	f	f [f]	f (夫 Fu)	[f]	

45 李滿 (Charles Leaman) 《無師初學英文字》 (*General Romanization of the Mandarin Dialect, A Primer for Schools and Self-Instruction*, 1897) 為罕見書目，筆者尚未取得，本文中所列該書的羅馬字標音，皆引用自內田慶市 (2015)。李滿書中雖區別南北官音，但羅馬字列表並不區別，表中所列「前字」(聲母) 共 23 個，包含《正音新纂》沒有的 n-，以及考慮拼寫便利而生的 w、y。

46 表格中的 IPA 擬音為筆者所加。

47 書中列有南京官話的羅馬字標音，其羅馬標音與李滿標音大體一致。

48 本表也參考法國耶穌會士李秀芳 (Benjamin Brueyre, 1810-1880) 《拉丁語南京語詞典》 (*Dictionarium Latino Nankinense Juxta materiarum ordinem dispositum*, 1847) 中的拉丁字母標音，發現該書所錄南京話拼音與其他資料落差較大，且作者對南京話性質恐有誤解，有待進一步撰文討論，故未將其標音列入表中。本文所參，為法國里昂市立圖書館藏本影印，收入 (日) 內田慶市，《《南京官話資料集》：《拉丁語南京語詞典》他二種》之版本 (2020: 19-164)，內田輯本後附翻字索引。《拉丁語南京語詞典》相關研究可參葛松 (2020)。

(續接表九)

A. 正音新纂 20 母 1902			汪 2020 擬音 (IPA)	B. 李 滿標 音 ⁴⁵ 1897	C. 何美齡 ⁴⁶ 1902/1907	D. 中華教育 會 ⁴⁷ 1904	趙元任 1929 (IPA)	備註 ⁴⁸
	—	—	—	—	—	—	—	
03	抵 d	地以抵	[t]	d	t [t]	d (地 Di)	[t]	
18	踉 t	體以踉	[t ^h]	t	t' [t ^h]	t (替 Ti)	[t ^h]	
	—	—	—	n	—	n (你 Ni)	—	李滿 n/l 分 中華 n/l 分 何 n/l 音節 表分但實際 不分
11	離 l	禮以離	[l]	l	n/l [l]	l (李 Li)	[l]	
06	隔 ge	格額隔	[k]	g	k [k]	g (格 Ge)	[k]	
09	克 k	刻額克	[k ^h]	k	k' [k ^h]	k (可 Ko)	[k ^h]	
08	嗜 h	害愛嗜	[x]	h	h [x]	h (害 Hai)	[x]	
07	及 gi	既以及	[tɕ]	dji	ch [tɕ] ⁴⁹	g (君 Djɯŋ 北京 / Gɯŋin 南 京) (捐 Djɯan 北京 / Gɯcin 南京)	[tɕ]	
10	氣 ki	器以氣	[tɕ ^h]	chi	ch' [tɕ ^h] ⁵⁰	chi, ki (羣 Chɯŋ 北京 / Chɯŋin, Kɯŋin 南京並存) (去 Chɯ 北京 / Chɯ, Kɯ 南 京並存)	[tɕ ^h]	

49 ch 在 i、ü 前表示 [tɕ] 音。

50 ch' 在 i、ü 前表示 [tɕ^h] 音。

(續接表九)

A. 正音新纂 20 母 1902			汪 2020 擬音 (IPA)	B. 李 滿標 音 ⁴⁵ 1897	C. 何美齡 ⁴⁶ 1902/1907	D. 中華教育 會 ⁴⁷ 1904	趙元任 1929 (IPA)	備註 ⁴⁸
17	喜 si	兮以喜	[ɕ]	hs	hs [ɕ]	hs (學 Hsue, Hsiao 北京並 存/Hsio 南京) (訓 Hsün 北 京 / Hsün 南 京)	[ɕ]	
05	知 g	之日知	[tʂ]	dj	ch [tʂ]	dj (知 Dji)	[tʂ]	
02	持 ch	遲日持	[tʂʰ]	ch	ch' [tʂʰ]	ch (充 Chong)	[tʂʰ]	
16	時 sh	恃日時	[ʂ]	sh	sh [ʂ]	sh (賞 Shang)	[ʂ]	
	—	—	—	—	—	—	—	
14	耳 r	而日耳	[ʐ]	j	j [ʐ] 然染日 jih êrh 兒耳	r (日 Ji 北京 / Ri 南京)	[ʐ]	
20	子 tz	字吡子	[ts]	ds	ts/tz(子 tzu) [ts]	dz (子 Dzi) (酒 Djiu 北京 / Dziu 南京)	[ts]	
19	此 ts	次吡此	[tʂʰ]	ts	ts'/tz' (此 tz'ü) [tʂʰ]	ts (次 Tsi) (親 Chin 北京 / Tsin 南京)	[tʂʰ]	
15	視 s	士吡視	[s]	s	s/ss(師思 ssü) [s]	s (色 Se) (生 Seng) (思 Szi)	[s]	
	—	—	—	w	w(娃 wa)	w(瓦 Wa 北京 / Waw 南京)	—	
	—	—	—	y	y(羊 yang)	y(羊 Yang)	—	

傳教士排列符號時多以英語或者拉丁字母的次序為基礎，李滿、何美齡、中華教育會的教科書都是以此編纂，正如現今的英語辭典的排序方式，其

知識基礎正是西洋字母順序，故有利外國人學習與使用。

趙元任曾批評：「外國人做的中國的單字音表總是不辨聲調，那是於理論於實際都是極不便的缺點。」（1929/2015: 259）然而，既然外國人「總是」如此，可見其中必有其便利所在，非如趙氏所說一無是處。因此，身為南京人的馬鳴鶴也採用英文字母或英文音節的先後來編排南京官話音節。

即使官話的字音表依照英文字母或英文音節排序，上述 A 至 D 四書的實際排列也並不相同，主要原因來自官話聲母所對應的西洋字母並不完全一致。例如，馬鳴鶴與李滿熟識，但並未採用李滿的標音方式，故編排順序也大為不同。又例如南京官話已無濁輔音聲母，「比」聲母可能對應 b 或 p；「抵」對應 d 或 t。再者，若涉及尖團音與翹舌問題時更為複雜，如「及」母在表九中可以對應 dj、ch、g 等符號，而「知」母竟然也能對應 dj、ch、g 等符號。可見當時的南京話中尚有可資區別的層次，但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本文更關注的是傳教士對於符號的選擇與排列，這些因素從另一角度反映了他們所認識到的南京官話，並且影響了讀者使用或者利用該書籍的方式。整體而言，西洋傳教士大多重視外國人是否方便使用，較不優先考慮中國讀者的背景與需求，因此西洋傳教士所編輯的官話教材之重點在於查閱方便，盡可能用符號來表達音位的差異，並且考慮到既有的通行拼法，因此 BCD 三書中處處可見威妥瑪拼音的影子。

與西洋傳教士的編纂方式相比，南京母語者馬鳴鶴對南京官話的音標次序之設計顯得獨特許多，簡單整理如下：

首先，《正音新纂》雖然採用英文字母次序但是盡可能讓對應的符號單純化。從表九可以觀察到，馬氏雖然知道西洋傳教士所流行的官話拼音，但是他並未採用，因為要為所有聲母都設計一個拼音符號，將會使得標音複雜化。因此他的系統允許聲母對應的英文字母重複，讓區別呈現在拼法之中，故有知（G）隔（Ge）及（Gi）都對應了字母 G，亦有合口介音 u 與撮口介音 ü[y] 都對應了字母 U 的情形。英文字母對應既有重疊，故將英文拼法的區別刻意設計於漢字定型字之中，只要是不同的定型字，就是不同的聲母或韻母。馬鳴鶴追求了符號的單純化，因而也有意忽略聲

調的重要性，並且省略了聲調的標示。⁵¹

其次，《正音新纂》不詳考音值，只求用 26 個字母可以區別音位的程度即可。初學英文的中國人可以透過背誦定型字，來記憶英文字母順序以及英文音節拼音的簡單規則。而初學南京官話的西洋人則可以透過定型字的切音來轉成羅馬拼寫，如「克偶口」可換成「K+eu>Keu」([k^h+əu>k^həu])，「此我挫」可轉換成「Ts+o>Tso」([ts^h+o>ts^ho]) 等，只要在腦中建構了如附錄一的音節表，即可使西洋學習者不受到聲調的限制，避開學習的難點，很快就能掌握南京官話的大致發音，對於傳教就能有實質的幫助。⁵² 這種不求發音精確，而是著重誦讀方便、符號簡化而產生的次序設計，符合其推廣「普通學」的教學目的。故馬鳴鶴〈凡例〉(1902: 55) 第 1 條即云：「是書原為童蒙正音而設，初不敢作為儒林大雅考音之券。」此外書末附有〈正音類讀〉，這是練習用的誦讀口訣，口訣的用意即是反覆練習馬氏所設計的母音、子音之定型字及其次序。⁵³

(二) 馬鳴鶴南京官話切音策略之優劣

從傳教士官話教材的共同特徵來看，馬鳴鶴的《正音新纂》也極為重視音標的對應以及字母排列的順序，因此他設計定型字來對應英語音節

51 關於聲調的說明，可見〈凡例〉(1902: 56-57) 第 6 條：「子音、母音、子母相生音等字下，俱就本音所括平仄字註出，凡無聲字者概行捐去，務使無白聲之誤，並將本聲所引之字，或竟有兩三聲及有他音一併註出，使有歸宿。」以及第七條：「切音家通以本音入聲列入他音，如『天』字入聲列『鐵』音。諸類茲概從簡，凡遇有與本音相合入聲字，通收入本音，以免雜混無著。」

52 如戴光於〈序〉(1902: 5-6) 中如此盛讚：「江甯馬生鳴鶴，膺是聘，閱二十年於古人審音反切之學。……爰著《正音新纂》一書，取首尾二音，定為子母，判其清濁，辨其離合，以土音之微臆正音之諦，理微而顯，法簡而賅，洵審音之捷範，而識文之秘鑰也。其嘉惠來學，良非纖杪，各國習中文者靡弗奉為圭臬。」

53 馬鳴鶴〈凡例〉(1902: 59) 第 14 條：「篇終附〈正音類讀〉一則，創句成讀，專為使學者備知子母及子母所生音字數，且依類仿讀，最利唇齒。識者諒之，故音中所拈之字非無義也。謹註。」同書〈發義·十一問〉(1902: 37)：「最妙在使童蒙習之，先讀子音，繼續母音，然後再讀子母相生音讀法，俱依後所列者，雖在結舌期艾之徒亦能牙語。」

以達到音標的對應，並在定型字的派列上嚴格依照英文字母順序，以利查找所有南京官話音節，查找的過程類似我們翻閱英文字典的模式。此外，馬鳴鶴兼顧了中國韻書中反切傳統，讓南京官話的音節形成兩個部分（定型字）相拼的型式，介音並不獨立出來。他的理想是要兼顧中國學子學英文、外國人學習南京官話，然而其書中採用的折衷方案只是權宜的辦法，嚴格說來並不妥善。

從其切音策略的優點來看：

1. 中西人士皆能使用：考慮到 26 個英文字母的直接應用，不設計新符號，且不採用其他西洋語言的符號，懂英文的西洋人經過學習即能應用其書。書中完全採用漢字來切音，沒有羅馬符號對應，受過中國傳統聲韻教育的人，經過學習即能理解書中拼法。

2. 考慮介音在聲韻之間的連音作用：馬氏切音方式著重的不是音節中各音段成分的疊加，而是聲母及韻母兩個音拍（*mora*）的組合。因而將韻母全都設計為零聲母字，並將聲母全都設計為開尾韻字，且聲母定型字所攜帶的元音，須與韻母的介音和諧，使其容易連讀。⁵⁴ 此種以連音合聲為目的，對聲、韻用字或符號進行設計的著作在形成一種風潮，從清代李光地、王蘭生《御定音韻闡微》（1726）、劉熙載《四音定切》（1878），乃至王照《官話合聲字母》（1900）、勞乃宣《增訂合聲簡字譜》（1905）中都能看到。⁵⁵ 上述諸書之設計相對於《正音新纂》都來得複雜，以《御定音韻闡微》的合聲切法為例，其反切用字雖以固定漢字為理想，但由於

54 正由於聲母都是開尾韻字、韻母都是零聲母字，故《正音新纂》中的子音與母音不得換位使用，因為一旦換位，切音時兩字之間會產生如同傳統反切的多餘成分，不僅有礙連讀，亦不符合英語拼音。馬鳴鶴曾於〈發義·三問〉舉例說明：「譬若『夫』音，開口音也；『安』音，收尾音也。『夫』生『安』則為『方』，『夫安』二音愈讀愈快，愈快愈尚，不待言『方』而『方』音已出矣。苟以『安』在先『夫』在後，硬使『安夫』二音成為一音，則音不歸於『安』即歸於『夫』，究竟不能別成一音，古人切音之弊，此其顯著者也。」（1902: 31-32）

55 即使諸書都考慮到連音拼讀的方便，但是參考的基礎與對拼音過程的設計各有不同。如《官話合聲字母》即是參考了日文假名並使用漢字偏旁作為符號，《正音新纂》則是參考英文字母拼音但使用完整漢字作為符號，二者大異其趣。前者相關論述可參朱鵬（2016）。《御定音韻闡微》之研究可參考林慶勳（1988）。

是依照等韻圖來設計，因此在聲母、韻母用字都依聲調分別設計，如東韻下的「東，都翁切」、「空，枯翁切」雖統一了下字「翁」，但董韻^{東上聲}的「董，覩孔切」、「孔，苦桶切」中不僅能看到上字因聲調而區別的複雜性，也能發現即使下字想要統一為「孔」但又不得與被切字相同，因而無法澈底將合聲用字統一。馬鳴鶴在聲母、韻母定型字的設計上不僅考慮了前人的反切改良，更透過不將聲調列入定型字的設計，使得拼音（切音）成分極為簡化。

3. 考慮到記憶的方便，設計記誦口訣：口訣依對應的英文字母順序，亦依介音分群。並且強調先讀子音（韻母），再加上母音（聲母），子母相拼之後生成音節，最後才調聲調。推測在馬氏的切音設計中，由於子音相對於母音來得複雜，是由多個音段組成，因此他認為 34 個子音（韻母）若能直接記憶，即不會產生錯誤的「MVE」組合，特別是當時其他方言的韻母常常混入官話的口音當中，所以先將韻母的形式記憶起來，再與聲母搭配，較符合教學效益。

4. 考慮到音節的突顯，而不優先考慮聲調：由於英語的音節結構較中文簡單，馬鳴鶴為了使南京官話切法能接近英語拼法，因而採用了母音、子音二拼的方式，而非獨立出介音的三拼方式。二拼方式也確實較符合南京官話的音節組成，參考劉丹青等（1995: 5-6）所描述的最老派南京方言，其韻母中的 -i- 介音大多讀為短 i[ɪ] 而非普通的 -i- 介音，因此三拼法獨立 i、u、y 介音的方式並不符合馬鳴鶴的音節韻律。不考慮聲調的好處如下，可以（1）減少符號量，使其易學。（2）可以精簡排序，使音節排列直接採用英文字母序，使其查找方便。採用英文字母順序排列雖然與洋人所編教材的字母序雷同，但由於排序中完全沒有為中文設計特有符號，也未納入聲調，因此系統簡明。相較之下，《官話羅馬字》、《南京官話》中都有例外排列的情形，且有依聲調列字，排序較為複雜。

5. 馬鳴鶴不將零聲母以及 y、w 等半元音作為聲母，是考慮到了初學者拼讀口誦的方便，亦即著重的是「切音」的方便，而非漢字「標音」的方便。切音重視的是口誦耳聞，但是標音較考慮書寫與閱讀，因此近代的官話標音系統常設計 y、w 作為零聲母字之首音，以便詞連寫的時候能夠區別音節。切音是兩字切唯一音，只考慮單一漢字的最終讀音，因而上下

字連音的過程中，馬鳴鶴盡可能刪去兩音節中的多餘成分。延續前述的合聲切法傳統，二合、三合等合音之法雖早在梵漢對音中出現，但清末文人的切音主要啟發自滿文標音，清末的音韻學者也普遍於切音法中提及滿文，正音書中提及滿文的情形極為常見，甚至西洋傳教士也有利用滿文及漢文來切英文的。⁵⁶

滿文的切音（合聲切法）中，若遇 i、u 介音之字，有時以 -iy-(-ij-)、-uw- 疊加標記的方式呈現；如漢字「賈 /tcia/」的滿文切音為 ᠵᡳᠶᠠ (jiya)[tcia]，-iy- 須連音為 [-i-]，但拆為 ji[tcɪ-]+ya[-ja] 兩音節來切音；漢字「鈞、郡 /kyn/」的滿文切音為 ᠵᡳᠶᠦᠨ (giyūn)[kyn]，雖須拆為 gi[ki-]+yūn[-jɔn] 兩音節來切音，但 -iyū- 連音為 [y]。又如漢字「官 /kuan/」的滿文切音為 ᠬᡠᠩ (guwān)[kuan]，以滿文 ᠬ + ᠩ (ku+wan) 兩個音節連記，但 -uw- 連音為 [-u-]。關於 i、u 介音，乃至 y 介音，滿文中還有其他連音形式，這些形式都是因為滿文音節限制而產生。⁵⁷

這裡要說的是，在馬鳴鶴所能接觸到的許多音韻書籍、正音書籍，無論是中國人還是西洋人所編纂的系統中，為零聲母字添加 w-、y- 音首的作法極為普遍，表九中的 BCD 三書皆是如此。馬鳴鶴之所以不採用 w-、y- 音首，雖然可以解釋為他可能已認識到 w-、y- 的非輔音性質並認為切音中夾入會影響音節的流暢度；但根據馬氏的論述，主要原因可歸於他將誦讀並且拼切出正確發音此一過程，作為他的主要設計目的以及教學目標。利用符號書寫音聲，不是他所追求的，換句話說，學會發音、切音之訣竅後，這個系統就可棄置一旁，因為下一步的教學重點是學習漢文讀寫。這與國語注音符號的設計概念頗為相近，都是一個便於初學、作為階段性用

56 如英人羅伯聃 (Robert Thom, 1807-1846)《華英通用雜話》(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1843)，收入(日)內田慶市、(日)田野村忠溫編著，《華英通語》四種：解題與影印》(2020)，書中切音非用於標漢字讀音，而是為了標英語，且因應英語音節標示之需求而將切音法細分為「切字」、「合字」兩類。

57 滿文對音及切法可參邵磊，該文中關於郡字的滿文表記誤為「kijoin」(2016: 71)，當為「kijɔn」。古籍可參清·存之堂輯，《圓音正考》(1743)，線上資料庫可查閱「Manchu Dic/ 滿洲語辭典」，<http://hkuri.cneas.tohoku.ac.jp/project1/manchu/list?groupId=11> (2021.9.2 上網檢索)。

途之語言學習工具。因此只要配合老師的教學學習，且處於南京官話的環境下，用《正音新纂》記住所有音節組合，絕非難事。

然而，上述幾項優點正反映了其切音策略的缺點：

第一，僅有漢字而無羅馬符號對應，雖然其定型字已帶有符號化的概念，但定型字仍然是漢字，不能單純反映音素，不僅容易使讀者其他漢字混淆，亦難以自學，須有母語教師引導，否則難以正確拼讀南京官話，也難以理解英文的音節拼法以及例外發音，書中的官話與英語的實際音值也有許多不同。

第二，例字過少，未列同音字表，非母語者無法類推其他漢字讀音，僅能作為切音表或音節拼音表使用。

第三，未曾定義聲調之調值，因此對於非母語學習者，不僅是單音節詞無法得知調值，更無法理解連讀變調、弱化音節的調值。即使書中設計口誦方法幫助記憶，仍須仰賴教師示範發音，因此從音節表的標準來看仍顯有不足。

總的來看，從《正音新纂》中的設計與教學對象來檢視，此書確實能夠符合馬氏於普通學所設立的目標，也能夠將其切音轉換成對應英文字母，進而讓西洋傳教士理解南京官話之音節。但是此教材若要推廣，須有母語者帶領，恐怕僅能局限於南京方言區，因此有普及的困難。此外書中對於音值、語音特徵的描述都是粗略且隱晦的，因此較難被方言學者直接引為參考。

五、結 論

本論文以清末中國傳教士馬鳴鶴的《正音新纂》為材料，參考同時代的多部南京官話文獻，並比較方言調查資料之後，對前人研究中所擬出的音系進行調整。前人研究多僅以南京方言資料為本，得出的音系並不符合馬鳴鶴對《正音新纂》的編排理念以及音節數量，因此本研究換個角度出發，先依據馬氏的安排建構出書中完整的音節表（附錄一），而後才加以擬音，並且確認了音位是否對立的問題。從第三節音系探討部分，對前人的擬音稍作了調整，調整後的《正音新纂》音系與《南京官話》中的音節分布頗為接近。

其次，本文第四節討論了馬鳴鶴的切音設計，《正音新纂》雖極度簡化了切音所需的成分與過程，仍能看出馬氏折合清代流行的合聲切法以及英語音節拼音的努力。馬氏並為書中的 20 聲母以及 34 韻母各自設立了定型字，這些定型字依英語字母序排列，所有的南京官話音節次序也都依據英文字母序來排列，書末並設置了〈正音類讀〉記誦口訣。這些設計完全符合其南京官話教學理念，也能配合江淮一帶進行基督教傳教所需的語言基礎教育；儘管如此，缺點也不容忽視。總言之，《正音新纂》讓我們看到了清末正音書的一種特殊編纂思維，即使書中沒有羅馬符號標音，我們仍可透過隱藏於書內的音節表，歸納出馬氏所描繪的南京官話音系。

附錄二

《正音新纂》南京官話音節表（重排）

	1 1(0)	ai an-an)	ai au	a(2)	a(2)	au	an-an)	o(2)	o(2)	oi	oi?	iau	ia(2)	ia(2)	uan-uau)	ui(2)	uai	ua(2)	un	X, iu	y(2)	y(2)	yn	yen	n-p											
子母	1.哏	15.日	2.安	32.阿	3.初	4.愛	4.頓	5.頓	23.區	20.我	21.鐵	6.以	7.野	8.羊	9.要	10.因	11.威	12.崖	13.約	14.用	16.有	17.雅	28.無	29.忘	30.危	31.至	33.挂	34.開	22.響	24.遇	25.越	26.云	27.屬	19.屬		
B.1.比p					報		白	白	咳	扇	勝			別		表	裏	邊	敗																	18字
P.13.屬pʰ					排		珀	珀	翼	朋	頤			撇		擢	品	編																		18字
M.12.屬m					馳		美	伴	們	磨	磨			蘆		妙	名	餘																	14字	
F.4.符f							慶	否	分																										5字	
D.3.抵t							得	開						迭		調	丁	點																	18字	
T.18.屬tʰ							特	騰						鐵		條	抵	甜																	17字	
L.11.屬l							勒	能						裂		了	零	念																	22字	
Ce.6.屬k							剛	苟								耿	果	公																	18字	
K.9.克kʰ							改	開								可	火	烘																	18字	
H.8.屬x							晴	吼																											13字	
Gi.7.及te							成									教	謹	好																	14字	
Ki.10.氣tɕʰ							楷									稱	動	避																	14字	
Si.17.寧ɕ							楷									漱	興	飲																	15字	
Tz.20.子ts							早									將	動	潛																	24字	
Ts.19.此tsʰ							曹									踏	請	情																	28字	
S.15.務ʂ							觀									驚	親	心																	25字	
G.5.知tʂ							這									珠	道																		18字	
Ch.2.持tʂʰ							徹									出	戲	推																	14字	
Sh.16.時ʂʰ							向									舒	爽	睡																	13字	
R.14.耳ʂ							熱									肉	軟																		11字	
							0字	17字	16字	15字	15字	17字	14字	15字	3字	12字	7字	12字	12字	2字	7字	0字	9字	1字	17字	13字	5字	3字	13字	0字	7字	5字	5字	0字	註：307字 + (字)34 + (字)34 + (字)34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清·存之堂輯，《圓音正考》（1743），《續修四庫全書》經部小學類第 25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據清道光十五年京都三槐堂刻本影印。
- 清·李汝珍，《李氏音鑑》，《續修四庫全書》經部小學類第 26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清嘉慶十五年寶善堂刻本影印。
- 清·馬鳴鶴，《正音新纂》，《晚清四部叢刊》第 9 編第 30 冊，臺中：文听閣圖書公司，2013，光緒二十八年（1902）金陵狀元境宜春閣活字擺印本。
- 清·莎彝尊，《正音切韻指掌》，《續修四庫全書》經部小學類第 25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清咸豐十年塵談軒刻本影印。
- （日）中田敬義譯，《北京官話伊蘇普喻言》，東京：山城屋左兵衛，1879。
- （日）岸田吟香校閱，（日）小倉錦太、（日）金澤保胤編，《支那南部會話：一名·南京官話》，東京：博文館，1895。
- （日）御幡雅文編，《華語跬步》（1903），東京：文求堂，1908，增補第 7 版，東亞同文會藏版。
- （英）羅伯聃（Robert Thom），《華英通用雜話》（*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1843），收入（日）內田慶市、（日）田野村忠溫編著，《《華英通語》四種：解題與影印》，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2020，頁 75-133。
- Manchu Dic/ 滿洲語辭典，<http://hkuri.cneas.tohoku.ac.jp/project1/manchu/list?groupId=11>（2021.9.2 上網檢索）
- Conference Committee on Romanization, Education Association of China, ed. *The Standard System of Mandarin Romanization: Introduction, Sound Table, and Syllabary*.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4.
- Hemeling, Karl Ernst Georg. *Die Nanking Kuanhua*. Göttingen: Druck der Dieterichschen Univ.-Buchdruckerei (W. Fr. Kästner), 1907.
- Hemeling, Karl Ernst Georg, and George Carter Stent.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and Handbook for Translators, including Scientific, Technical, Modern and Documentary Terms*.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16.

Williams, S. Wells. *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Wu-Fang Yuen Yin, with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Characters as Heard in Peking, Canton, Amoy, and Shanghai*.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4.

二、近人論著

- 丁 蓉 2011 〈明代南直隸各府舉人的地理分布〉，《學術探索》2011.5(2011.10): 94-97。
- (日) 千葉謙悟 2010 〈来華宣教師の中国語教育——プレマール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1720) から——〉，收入(日) 篠原啓方等編著，《文化交渉による変容の諸相》，大阪：關西大學文化交渉學教育研究處點，頁 327-350。
- (日) 千葉謙悟 2019 〈西文資料與官話研究——兼論官話觀之差異以及南北官話的概念——〉，《中国語学》266(2019): 44-62。
- (日) 内田慶市 2015 〈《無師初學英文字》——清末南北官音差異一斑〉，《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8(2015.3): 25-33。
- (日) 内田慶市 2020 《《南京官話資料集》：《拉丁語南京語詞典》他二種》，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
- (日) 石崎博志 1998 〈《正音切韻指掌》と《正音再華傍註》——編者・莎彝尊の正音觀〉，《日本東洋文化論集》4(1998.3): 57-78
- (日) 石崎博志 2014 〈正音資料の特質〉，《日本東洋文化論集》20(2014.3): 1-30。
- 朱 鵬 2016 〈漢語切韻史上における「官話合声字母」の意味〉，《中国文化研究》32(2016.3): 1-19。
- 汪 瑩 2020 〈《正音新纂》の語音系統及其音系性質〉，《古漢語研究》126(2020.3): 99-104。
- 沈國威 2011 〈近代英華華英辭典解題〉，大阪：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
- 周愚文 2015 〈羅振玉日本教育考察與晚清學制制定的關係〉，《教育研究集刊》61.1(2015.3): 1-33。
- 林 琳 2017a 〈《漢英韻府》南官話音系研究〉，《銅仁學院學報》19.5(2017.5): 68-72。
- 林 琳 2017b 〈《漢英韻府》南官話音系比較研究〉，《哈爾濱學院學報》38.5(2017.5): 121-125。

- 林慶勳 1988 《《音韻闡微》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 邵 磊 2016 〈清—朝鮮時期漢·滿·韓互譯中的文字對音——以《漢清文鑑》滿文的韓文表記法為例〉，《編譯論叢》9.2(2016.9): 57-92。
- 徐朝東、陳琦 2018 〈《南京官話》音系初探〉，《合肥師範學院學報》36.5(2018.10): 1-5。
- 張屏生 2002 〈清末民初南、北官話的語音比較〉，《聲韻論叢》12(2002.4): 129-145。
- 彭 靜 2014 〈《正音新纂》聲母系統考：一百多年前南京官話的聲母系統〉，《중국어문학논집》(中國語文學論集) 86(2014.6): 79-100。
- 彭 靜 2015 〈《正音新纂》韻母系統考〉，《중국어문학지》(中國語文學論集) 50(2015.3): 207-234。
- 曾曉渝 2016 〈明代南京官話性質考釋〉，《語言科學》15.2(2016.4): 178-187。
- 葛 松 2020 〈耶穌會士李秀芳生平及其《按照主題排列的拉丁語南京話詞典》初探〉，《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13(2020.3): 289-304。
- 趙元任 1929/2015 〈南京音系〉，收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主編、孟曉妍選編，《趙元任文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頁 252-274。
- 齊 燦 2018 〈威妥瑪的語言觀研究：以《語言自邇集》為中心〉，《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51(2018.4): 179-192。
- 劉丹青、李榮 1995 《南京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錢 鷗 2009 〈學·智·人的理念：試論王國維與晚清興學育才的思想契機〉，《語言文化》12.1(2009.8): 85-109。
- 戴黎剛 2017 〈晚清的官話音系及其性質〉，《古漢語研究》117(2017.12): 28-41。
- Chen, Shu-Fen. "Vowel Length in Middle Chinese Based on Buddhist Sanskrit Transliteration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4, no. 1 (January 2003): 29-45.

The Phonological and Romanization Systems of Nanking Guanhua in *Zhengyin Xin Zuan*

Tseng Jo-han*

Abstract

Several Mandarin dictionaries or teaching materials written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share a common trend; that is, the adopted Mandarin phonological systems were primarily based on the Peking or northern Guanhua 官話 dialects instead of its southern counterpart, but in reality, these Peking Guanhua textbooks included pronunciation styles and forms that inherit from traditional or southern Guanhua phonetics. Within this context, a portion of these materials retain a “pure” form of southern Guanhua, especially Nanking Guanhua, awaiting us to research. The present paper focuses on *Zhengyin xin zuan* 正音新纂, a text on Nanking Guanhua written by Ma Minghe 馬鳴鶴 (?-?) in 1902 which refers to other Mandarin textbooks authored or edited by Western missionaries, such as Karl Ernst Georg Hemeling’s (1878-1925) *Die Nanking Kuanhua* (1902/1907) as well as *The Standard System of Mandarin Romanization: Introduction, Sound Table, and Syllabary* (1904) published by the Education Association of China. These three works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one another as all were published just a few years apart by missionaries and have a practical purpose pertaining to popular education. Moreover, being based on the endeavors of missionary work, they differ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phonetic books in that they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presentation of phonetics. Specificall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cuss two aspects: (1) reexamine the full syllable chart of *Zhengyin xin zuan* and rebuild its phonological system of Nanking Guanhua; and (2) evaluate the pros and cons of Ma Minghe’s teaching strategies underlying the work’s Nanking Guanhua syllable chart.

* Tseng Jo-ha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Keywords: Nanking Guanhua, Nanjing Mandarin, *Zhengyin xin zuan* 正音新纂, Chinese romanization systems, syllable charts, missionaries

